

论敦煌写本《尚书》的异文类型及其特点

钱宗武 陈楠*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 本文运用今传本《尚书》对敦煌写本《尚书》进行逐字对照, 穷尽性地搜集所有异文, 比较异同, 归纳出八种异文类型。在时空背景和文化背景中考量今传本《尚书》和敦煌写本《尚书》的文本状态, 推演文字雅俗流变的规律, 求证敦煌写本《尚书》异文的特点, 试图通过语言学方法正确评价今传本《尚书》和敦煌写本《尚书》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 《尚书》; 今传本; 敦煌写本; 异文

中图分类号: K221.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6)03-0047-06

《尚书》是中华民族辉煌的文化宝库中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它几经劫难, 又兼《尚书》今、古文之争和真伪之讼, 在版本、篇目、内容、文字上皆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通行的《尚书》文本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卫包等人改定的文本, 后代虽略有改动, 但大体保持原貌。敦煌写本《尚书》的抄写年代经姜亮夫先生考定, 最早为南北朝, 最晚为唐朝初年^[1]。它封存于鸣沙洞中上千年, 保留了卫包改字之前的抄本的文本状况。因此, 敦煌写本《尚书》的出现立即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敦煌写本《尚书》共有二十五个卷子, 文本情况纷繁复杂, 既有古文《尚书》的抄本, 亦有今文《尚书》的抄本。其中今文《尚书》有四个卷子, 其它各篇均为古文《尚书》。敦煌写本《尚书》中真正有关传本《尚书》原文的仅有二十三卷。这二十三卷共涉及《尚书》篇目二十七篇, 其中在敦煌写本中仅出现一次的有十个篇目; 重现的有十七个篇目。

将敦煌写本《尚书》和今传本《尚书》对校, 可以发现两者在内容及语法上基本相同, 其差别主要在于异文现象。这里所谓“异文”不仅指异体字, 还指同一个字的所有不同写法。

学术界上世纪初就注意到了敦煌写本《尚书》的异文现象。诸如: 王国维先生《古文尚书孔氏传汇校》, 用日本古写本校敦煌《隶古定尚书》; 姜亮夫先生《敦煌学论文集》中有敦煌写本《尚书》的校勘记; 吴福熙先生用《十三经注疏》的传本《尚书》校勘敦煌写本《尚书》。先贤时修在校勘方面的工作已取得长足的进展, 但其它方面尚未暇涉及。因而, 对于敦煌写本《尚书》的异文研究应继续全面深入地展开。有鉴于此, 本文用今传本《尚书》对敦煌写本《尚书》进行逐字对照, 穷尽性地搜集所有异文, 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对比研究: 一是研究敦煌写本《尚书》与今传本《尚书》对校所反映出来的异文现象; 二是研究敦煌写本《尚书》中重现篇章的异文现象; 三是研究敦煌写本《尚书》中同一个字在使用上的异文现象。归纳异文类型, 推演文字雅俗流变的规律, 以求用语言学方法确定文献的价值。

一、敦煌写本《尚书》的异文类型

用今传本《尚书》(以下简称“今本”)对校敦煌写本《尚书》(以下简称“写本”), 异文现象可分为七种类型:

1.1 今本用今字, 写本用古字:

(1—1) 用罪伐厥死。(《尚书·盘庚上》)

(1—2) 用臯伐昏死。(伯2643号)

按: “臯”与“罪”为古今字。《说文·辛部》: “臯, 犯法也。从辛从自, 言臯人蹙眉苦辛之忧。”而“罪”本义是“捕鱼的竹网”, 典籍中未见用例。《说文·辛部》: “秦以‘臯’似‘皇’, 改为‘罪’。”《说文解字

收稿日期: 2005-05-25

作者简介: 钱宗武(1952—), 男, 江苏东台人,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史和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陈楠(1982—), 女, 江苏南通人, 扬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 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注》：“此志改字之始也。古有假借字，而无改字。‘罪’本训为‘捕鱼竹网’，从网非声，始皇易形声为会意。”^{[2]P741}许慎认为“罪”是一个会意字，《说文·网部》：“罪，从网、非。秦以‘罪’为‘皐’字。”《说文解字注·网部》：“罪，本形声字，始皇改为会意字。”“罪”代替“皐”之后，一直沿用至今。敦煌写本保留了其古字写法。

(2—1)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尚书·说命下》）

(2—2) 右我烈祖，格于皇天。（伯 2643）

按：《说文·口部》：“右，助也。”《说文解字注》：“从口、又，手不足以口助之，曰助也。今人以左、右为佐、佑。”^{[2]P58}“右”后假借为方位名词，“佑”为后起区别字。《白话尚书》：“佑，辅助。”^{[3]P305}伯 2516 中用作“右”，敦煌写本用其古字。

1.2 今本用本字，写本用通假字；

(1—1) 非予有咎。（《尚书·盘庚上》）

(1—2) 非予又咎。（伯 2643）

按：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并不是我的过错。”这里“有”是“有无”之“有”，用其引申义。《说文·有部》：“有，不宜有也。”《说文解字注》：“引申为凡有之称。”^{[2]P314}“不宜有”正反引申为“有”。《说文·又部》：“又，手也，象形。”《说文解字注》：“又，即今之‘右’字。”^{[2]P114}可见，从“又”字无法直接引申出“有无”之义。又因“有”为之部、匣母，“又”亦是之部、匣母，此处“又”为“有”之同音通假字，写本用了通假字。古籍中“又”假借为“有”的情况极为多见，如：《诗经·周颂·臣工》：“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中“又”为“有”之通假字。而在古代文献中“有”和“又”可互相通假，“有”亦可以通假为“又”，如：《诗经·邶风·终风》：“终风且曠，不日有曠。”敦煌写本《尚书》此句中“又”为“有”的通假字。

(2—1) 導弱水至于合黎。（《尚书·禹贡》）

(2—2) 道弱水至于合黎。（伯 4033）

按：《尚书易解》：“導，谓疏通。”^{[4]P68}用“導”之引申义。《说文》：“導，引也。”《说文》：“道，所行路也。”与“疏通”没有直接的联系。“道”、“導”都是幽部，定母。这里“道”是“導”之双声叠韵的通假字。古代典籍中这种通假较为多见。如《离骚》：“乘骐骥以驰兮，来吾道夫先路。”《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1.3 今本用通假字，写本用本字：

(1—1) 暨余一人，猷同心。（《尚书·盘庚上》）

(1—2) 泉余一人，猷同心。（伯 2643）

按：敦煌写本中“暨”作“泉”或“泉”。《尚书易解》：“暨，与也。”^{[4]P308}用“泉”之本义。《说文·丞部》：“泉者，众与词也。”《说文解字注》：“‘泉’之假借多作‘泊’，作‘暨’。”^{[2]P308}《说文·旦部》：“暨，日颇见也。”“暨”与“泉”双声叠韵，此处“暨”为“泉”之通假字，写本用其本字。而写本中亦有写成“泉”者，如：“曰：‘曷不泉朕孙有比？’”（伯2516《盘庚中》）“泉”当为借字“泊”之俗字^{[5]P1610}。“暨”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而张玉金先生研究甲骨文用字情况认为甲骨文中不见“泊”字，管燮初先生认为西周金文亦不见“泊”。《说文·水部》：“泊，灌也。”文献中“泊”曾假借作介词“及”，那应在春秋之后。文献中的虚词都是在同义类化的过程中发展的，“泊”后世文献中使用频率远低于“暨”，现代汉语中也基本不再使用，而“暨”则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可见敦煌写本中用“泉”当为用其原字，而写成“泉”则为“泉”之因形近而写的俗字。

(2—1) 惟干戈省厥躬。（《尚书·说命中》）

(2—2) 惟干戈省厥躬。（伯 2643）

按：《白话尚书》中这里的“省”解释为“伤害”，用“^{[3]P363}省”之引申义。《说文·目部》：“省，目病生翳也。”《说文解字注》：“引申为灾省。”^{[2]P134}《说文》：“省，视也。”其意义与“伤害”没有直接联系。而“省”、“省”双声叠韵，这里“省”为“省”之同音通假字。先秦“省”、“省”常通用。《周书·康诰》：“人有小罪非省”，《潜夫论》引作“省”^{[6]P363}。《周书·洪范》：“王省惟岁”，《史记》引作“省”^{[6]P316}。

1.4 今本用通假字，写本亦用通假字：

(1—1) 乃命于天，予岂汝威。（《尚书·盘庚中》）

(1—2) 乃命于天，予岂女畏。（伯 2516）

按：“女”本义是“妇人”，《说文·女部》：“女，妇人也。象形。”用作对称代词，是“本无其字”的

假借。“女”是出现最早的一个对称代词，在殷墟甲骨文中业已使用，《殷墟文字·甲编》：“王臣女其入手从又同，女我克孥二人。”金、甲文中只有“女”而没有“汝”。今文《尚书》多用“汝”，不用“女”。而敦煌写本《尚书》中，几乎所有的“汝”都写作“女”。《说文·水部》释“汝”为水名，以“女”为声符，二字音同义别。妇人之“女”是高频词，为了避免歧义，或以“汝”代“你我”之“女”。今文《尚书》“汝”凡148见。可见写本中用“女”或保存较早的写法。

(2—1) 汝弗濟臭厥載。(《尚书·盘庚中》)

(2—2) 女弗濟臭毕哉。(伯2643)

按：一般认为“毕”是“厥”之古字，或有不当。“厥”本义是一实词，《说文·厂部》：“厥，发石也。”“发石”即“掘石”，引申有“挖掘”之义。实词词义虚化，假借义犹“其”。《尔雅》：“厥，其也。”《说文解字注》：“厥，其也。此假借也。假借盛行，而本义废矣。”^{[2] P447}“毕”本亦实词，《说文·毕部》：“毕，木本也。”因读若“厥”，而同音假借为“厥”。

《盘庚中》今本和写本此句中“载”、“哉”二字也都是假借字。《说文·车部》：“载，乘也。”《尚书易解》：“载，事也。”^{[4] P101}载，之部，精母；事，之部，从母；“载”为“事”之同韵通假字。此用法古籍中极多见：《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马瑞辰云：“载、事，古通用。”《史记·五帝本纪》引《尧典》：“有能奋庸熙帝之载。”“载”引作“事”。敦煌写本又用“哉”为“载”之通假字。《说文·口部》：“哉，言之间也。”哉，之部，精母，是“载”之同音通假字。

1.5 今本用正字，写本用俗字：

(1—1) 则曰：“时予之辜。”(《尚书·说命中》)

(1—2) 则曰：“岂予之辜。”(伯2516)

按：“辜”为“辜”之俗字^{[7] P140}。《龙龕手鏡·古部》：“辜，俗。辜，正。”^{[8] P339}《汉语大字典》：“辜，同‘辜’。”^{[5] P1847}“辜”又是“辜”的俗写变体：俗书“古”旁上部的一竖多写作一撇，形与“右”相乱。如敦煌卷子中“苦”与“若”往往不分。所以敦煌写本《尚书》又将“辜”写作“辜”。

(2—1)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尚书·盘庚中》)

(2—2) 汝害弗念我古后之闻。(伯2643)

按：《说文·日部》：“曷，何也。”《说文·宀部》：“害，伤也。”《说文解字注》：“《诗》、《书》多假借‘害’为‘曷’。”^{[2] P341}《诗经·周南·葛覃》：“害澣害否？归宁父母。”毛传曰：“害，何也。”“害”为“曷”的通假字。伯3670中即写作“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而“害”为“害”之俗字，《龙龕手鏡·宀部》：“害，古。害，正。”^{[8] P157}此处，写本用正字“曷”的通假字之俗字。

1.6 今本用正字，写本用讹字：

(1—1) 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尚书·多士》)

(1—2) 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立。(伯2748)

按：此句中“立”当为“居”之误。《尚书易解》：“居，江声谓所居之业。《诗·蟋蟀》：‘职思其居’亦谓所为之事也。”^{[4] P231}而《说文·立部》：“立，伫也。”《说文解字注》：“伫，读若‘树’，与对竖音义同，不当作住。”^{[2] P373}且传文为“今汝惟是敬顺居汝邑，继汝所当居。”可见作“居”亦与传文合。因敦煌写本中“居”俗写作“𡵓”，《汉语大字典》：“𡵓，同‘居’。”^{[5] P970}“立”可能为“𡵓”脱“尸”而误。

(2—1) 君之道不宽，缓其心，言含怒。(《尚书·无逸》)

(2—2) 君之道不宽，缓其心，言含怒。(伯3767)

按：“怒”当为“恕”之误。此句为经文“不宽绰厥心”之传文。《尚书易解》：“言此之不从，人乃诳汝以小人怨骂汝，汝即信之，即将若是：不长念其法，不宽恕其心，妄行杀罚……此节言引导不明之恶果，《孔疏》曰：‘言褊急使民怨若是，教成王勿学此也。’”^{[4] P240}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不放宽你的心”，即是含怒的意思。《说文·心部》：“怒，恚也。”符合上下文意思。而《说文·心部》：“恕，仁也。”刚好与上下文语义相悖。且伯2748中亦写作“怒”。可见“怒”盖为“恕”之形近误字。

1.7 今本用讹字，写本用正字：

(1—1) 成王尽礼至于周公，来教诲之。(《尚书·洛诰》)

(1—2) 成王尽礼至于周公，求教诲之。(伯2748)

按：“来”当为“求”之误。此句是经文“拜手稽首诲言”之传文。《尚书易解》解释为：“拜手稽首受公教诲之言”，即是指成王是作为受事者，接受周公的教诲。用“求教诲之”符合上下语境。若改成“来教诲之”，整个含义就颠倒过来了，成为“成王教诲周公的意思”，成王则成为施事者，周公成

为受事者了。且古本、岳本、宋版、《尚书纂传》均用作“求”。“来”与“求”两者小篆形近。可见今本“来”或为卫包改字时因形近所改的误字。

(2—1) 非先祖不助子孙,以王淫过,戏迨用,自绝于先王。(《尚书·西伯戡黎》)

(2—2) 非先祖不助子孙,以王淫过,戏怠用,自绝于先王。(伯 2516)

按:今本“迨”当为“怠”之误。这句是经文“非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之传文。《尚书易解》解释为:“言王游戏自绝于天,先王无能相助也。《史记·殷本纪》云:‘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是其事也。”^{[4]P115}可见其传文的含义应是“淫荡嬉戏,懒于国事。”《说文·心部》:“怠,慢也。懈,怠也。”与传文意义相符。《说文》中未收“迨”字,《尔雅·释言》:“迨,及也。”^{[9]P98}《辞源》:“迨,①及,趁着;②等到。”^{[10]P3049}这些释义与经文传文意义不合。而古本、岳本、宋版、《尚书纂传》均写作“怠”,伯 2643 中亦用作“怠”。知今本“迨”或为卫包改字时因其隶古定所误。

二、敦煌写本《尚书》异文的特点

比较敦煌写本《尚书》和今传本《尚书》,敦煌写本《尚书》的异文现象,有如下特点:

2.1 敦煌写本《尚书》的通假现象较今本《尚书》更为常见,且通假字多用简笔,抄写省便是其形成动因。

通假是汉字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它的主要特点是标音,而意义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一般学者认为通假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无其字”的通假,是造字法。即当语言中产生了新的概念而没有相应的词来表达这个概念,于是就借用一个声音相同的字来表达这个概念,从而产生一个“新字”。本文中所讲的通假字则主要是另一类“本有其字”的通假,是用字法。这类通假字的产生原因已经不是为了满足用字的需要,而是在汉语缺乏严格规范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历史语言现象,被认为是“别字”。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说:“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11]P6}可见,这类通假字实质上是古人所写的错别字。印刷术未盛行之前,古人问学主要是口耳相传。通假字则是学习者仓促间忘其字,而以同音字来代替的结果。这种情况先秦颇盛行。但通假字脱离了汉字形义合一、见形知义的形式特点,造成了汉字在时空中传播的困难。清王引之便指出:“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顺理;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12]P252}固而两汉以后逐渐减少。两汉隋唐以后逐渐减少,后人仍使用这种“别字”,主要是好古和沿用。

敦煌写本大量使用通假字,一方面是好古和沿用,例如:“導”写作“道”(伯 3169);“云”写作“貧”(伯 2643);“猷”写作“繇”(伯 2748)等等。另一方面,敦煌写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它大量使用通假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抄写的方便,选择同音字中笔画较为简单的字,作为通假字加以使用,如“哉”写成“才”(伯 2516);“歌”写成“哥”(伯 2533);“越”写作“曰”(伯 2748)等等。这类通假用法的目的是为了图省便,与俗字共同朝着同一方向度发展。翟颋在《通俗编》卷一中也提到古人俗用通假的情况:“今市井所用,不惟任意减除,且多误犯别字,如以‘圣’为‘聖’;以‘体’为‘體’;以‘听’为‘聽’……旧俱原有其字,而音义大殊。”^{[13]P12}“里俗造伪之情,大抵趋省便。而字之省笔者却未得尽斥为伪,如‘萬’之为‘万’,‘箇’之为‘个’,‘禮’之为‘礼’……多属《说文》本字,或见于经传大典,士君子所不避也。”^{[13]P11}这样的通假字由于笔画简单,而为抄写者所乐用。上世纪 50 年代在繁体简化的过程中,有些简体字就是采用了同音假借的方法产生的。

2.2 敦煌写本《尚书》中大量使用俗字,俗字亦多用简笔,其主要原因是为了便于书写。

敦煌文书主要是佛教寺庙的藏书,是“俗人”的文书,其传抄者主要是普通的僧侣、低级官员和其他劳动人民,所以用字多为当时通用的俗字。而且魏晋南北朝、李唐初年是俗体字产生和流行的两个高峰期,敦煌写本《尚书》作为这一特定时期的代表文献,俗字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字运用最为显著的特点。

敦煌写本《尚书》中俗字的使用情况纷繁复杂,但其总体目的都是为了书写方便。敦煌写本《尚书》中俗字的使用有以下特点:第一,因为早期汉字结构复杂,抄写者为求简便,就常常减省笔画。例如写本中“誨”写作“售”(伯 2643);“怒”写成“恣”(伯 2643);“賁”写成“瑤”(伯 2516)等等。第二,为了便于书写,书写者经常省略偏旁。例如“搜”写成“叟”(伯 3469);“疆”写成“疆”(伯 2748);“俾”写作“卑”(伯 3871)等等。第三,对有些字,书写者为了简便,改变其偏旁。例如,“矧”写作“攵”(伯 2643),“琳”写作“玲”(伯 3469),“颁”写作“攸”(伯 2748);“豫”写作“愈”(伯 2533)。第四,为了便于书写,抄写者有时甚至对一些字符进行重新创造。诸如:“戰”写作“非”(伯 2535);“罔”写成“它”(伯 2643);“夷”写成“旦”(伯 3469)。第五,敦煌写本中的俗字书写比较随意,同一字在不同的卷子中有不同的写

法。例如“恐”写成“𢞏”（伯2643）或“𢞐”（伯2516）；“罔”写作“冈”（伯2748）或“𠂔”（伯2643）；“會”写作“𠂔”（伯2643）或“𠂕”（伯2533）；“敢”就有“𢞐”（伯3670）、“𢞑”（伯2516）、“𢞒”（伯2643）、“𢞓”（伯2516）、“𢞔”（伯2643）和“𢞕”（伯2643）六种形似的写法；甚至同一个字在同一卷中也有不同的写法，如“𢞐”在伯2533中有“𢞐”和“𢞑”两种不同的写法；“𢞐”在伯2643中就有“𢞐”、“𢞑”、“𢞒”和“𢞓”四种写法。

俗字成长于民间的土壤，大抵是“下里巴人”约定俗成的存在，其使用范围仅限于一般的文契、籍帐、文案等，而作为儒家经典的《尚书》则不应该使用俗字。《干禄字书·序》：“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14] P3}清代缮写《四库全书》，规定书写格式的《辨证通俗文字》中亦写道：“俗者，承袭鄙写，断不可以从者也。”^[15]可见俗字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通用，断不可在官方整理的经典中使用。卫包等人将隶古定改为楷书本，至开成石经刻成，使楷书有了一定的规范，这对肃清六朝以来俗体字的泛滥，规范汉字字体都功不可没。敦煌写本《尚书》中的俗字可作为研究隋唐时期俗字使用情况的重要语料。

同时，俗字存在仍然有它的合理性，俗字趋于简化的趋势与汉字简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卫包所改定的《尚书》文本中，也有吸取俗字中合理的部分的，如“说”改成“悦”；“躬”写成“躬”。且俗字与正字的概念是相对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秘”字为六朝之后的俗字，其正字为“祕”，《说文·示部》：“祕，神也。”而在《干禄字书》中“秘”则成为正字，“祕”为俗字，到了现代，只见“秘”，而不见“祕”了。再如“躬”字，《说文》：“躬，俗从弓身。”“躬”为“躬”之俗字，而在《干禄字书》中将“躬”、“躬”并列为正字，到现代汉语中，“躬”成为唯一的正字了。

2.3 敦煌写本《尚书》肯定经过人为的加工，保留了抄写时期的语法习惯。

敦煌写本《尚书》中“不”几乎都写作“弗”。如《尚书·说命下》：“事不师古，以克永世”，伯2643中引作“事弗师古，以克永世”。“不”和“弗”是同源词。但两者在意义和用法上都有细微的差别：《说文解字注》：“‘不’与‘弗’字音义皆殊，音之殊则‘弗’在十五部（‘不’在一部），义之殊则‘不’轻‘弗’重。”^{[2] P584}如：《公羊传·桓公十年》：“其言‘弗遇’何？”注“弗，不之深也。”《春秋》公孙敖如京师“不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在语法上，两者也有些不同之处：“弗”较之于“不”与谓语的黏附性更强一些，“弗”和谓语之间一般不可以插入其它成分。而“不”语法功能灵活，在“不”和谓语之间可以插入其它成分，构成“不+状语（介宾结构）+动词+宾语”的结构形式。例如：《周书·金縢》：“予元孙不[若旦]多才多艺。”“不”还可以和其它否定副词构成双重否定结构，如“罔不”，而“弗”则不可以。“不”是今本《尚书》使用频率最高的否定副词，其作否定副词在文中凡276见，其语法功能也最为丰富，除以上用法，“不”还可以和“可”、“克”、“能”等能愿动词构成固定结构，“弗”则没有这种用法。而敦煌写本《尚书》中几乎所有的“不”都写成“弗”（很少用“不”），且出现“罔弗”这样的用法，例如：《尚书·多士》：“罔不配天其泽”，伯2748引作“罔弗配天其泽”。与后代“弗”之语法功能不符，或抄写者并未意识到两者之间在书面语中的区别，而以其习惯均把“不”写成“弗”。

敦煌写本《尚书》中“乎”可用作介词，如伯2630中“其勿误乎庶狱庶慎”。这一句话的“乎”今文《尚书》写作“于”。今文《尚书》中几乎所有的“乎”均用作语助词，没有作介词的用法。“于”是汉语系统中最古老的介词之一，甲骨文中就已大量出现，它也是《尚书》中最高频的介词。今文《尚书》中仅有3个“乎”的语例用法类似于介词，皆见于《虞夏书·皋谟》：“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有些学者认为此处“乎”虽然置于动词与名词之间，但不是介词，而是句中语助词。因为“乎”后面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都不是“乎”的宾语，而是“乎”前面的及物动词“忧”、“迁”、“畏”的宾语。《说文》：“乎，语之余也。从兮，象声上越扬之形也。”“乎”原是拟声词，一般认为“乎”假借作介词，并得到普遍运用要到春秋战国时期。可见，敦煌写本《尚书》中“乎”用作介词应为抄写时期的一种习惯用法，今传本更多保存的是《尚书》的原始面貌。

《尚书》中无“也”字^[16]。敦煌写本《尚书》中经文部分没有“也”字。但敦煌写本《尚书》中的传文中大量使用“也”字，几乎每卷都较今本《尚书》传文衍出多处“也”字，如伯2643衍“也”字172处；伯2533衍77处。且这些“也”字几乎都是作者断句的标志：如伯2533中“四海会同，六府孔修”的传文“四海之内会同京师，……万国共贯也，……其修治政化和也”。再如，伯3169中“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的传文“……，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也”。“黑水、西河惟雍州”的传文“……，龙门之河在冀州西也”等等。

“也”字的产生是为了离析章句，用于句末相当于一个句号或者逗号的功能。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

“也”字，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也”字，到汉代诸如《史记》、《汉书》这样的大部头作品问世，书面语信息增大，表达日益复杂，没有明显的句子标识，就会给阅读带来不便，于是句末“也”字大量增加，司马迁在引用《尚书》时就用汉代通语译写，在句末加“也”字。宋朝刻书开始运用句读离析章句，句末“也”字在书面语中使用频率逐渐下降，直到现代汉语中完全消失。今本《尚书》传文中“也”字比较少见，敦煌写本《尚书》中传文中多“也”字，且多用于断句的标志，可能亦为抄写者所加，可反映当时“也”在民间的使用情况。

敦煌写本抄写的时间在卫包改字之前，保留了一些古字诸如：“时”写作“𠂔”；“以”写作“𠂔”；“射”写作“𠂔”等等。写本有时可以纠正今本中的一些错误，例如今本《尚书》由于楷化造成的错误；也可以纠正刊刻过程中所造成的错字，如《尚书·顾命》：“用勤对杨圣祖文武乏大教叙成王之意”中“乏”为“之”之误字。可知敦煌写本《尚书》具有不可替代的校勘学价值，当然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敦煌写本非一人一时所抄写，加上抄写者都不是研究者，其质量参差不齐。且多次传抄，衍脱讹错在所难免。同样，敦煌写本《尚书》用字也不统一，时古时今，时正时俗，没能很好地保持文本原状。此外，其中一些用法又受到当时习俗的影响，诸如：俗字的大量使用；“也”字的大量运用；“弗”字使用方法的特殊等。而今本《尚书》从梅氏献书后一直被立为官学，且抄写者一般都是研究者或学者，因此在卫包改字前基本能较为完整地保持原样，改字后又以石经的形式固定下来，因而今本《尚书》可以用来纠正敦煌写本《尚书》的俗字、讹字、脱文、衍字等现象。客观而论，今本《尚书》的文献价值应高于敦煌写本《尚书》。

参考文献：

- [1] 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经韵楼藏版影印本，1981.
- [3] 周秉钧.《白话尚书》[M].湖南：岳麓书社，1990.
- [4] 周秉钧.《尚书易解》[M].湖南：岳麓书社，1984.
- [5] 《汉语大字典》[M].湖北：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
- [6]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7] 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M].湖南：岳麓书社，1995.
- [8] [辽]释行均.《龙龕手鏡》[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 徐朝华.《尔雅今注》[M].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 [10] 《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1]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2]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13] [清]翟灏.《通俗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 [唐]颜元孙.《干禄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5] 《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6] 钱宗武.《今文尚书语言研究》[M].湖南：岳麓书社，1996.

On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riants in Dunhuang written text *shangshu*

QIAN Zong-wu CHEN Nan

(Chinese Department, Yang Zhou University, Yang 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trasts the characters in the Dunhuang written *shangshu* text with the text that spreads nowadays word by word, collects all the different character forms, compares these two editions. Eventually, we have summed up eight types of them. We verify the state of the two texts under the time, space and the culture background; deduce the regulation of the changes in its spread process, begging for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variant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text of Dunhuang written *shangshu* and the text spread nowadays by the linguistic method.

Key words: *shangshu*; the text spreads nowadays; the Dunhuang written text; variants